

番送别，又登隋堤，不妨寻觅旧时行踪。“又酒趁哀弦，灯照离席”二句，以一“又”字，将往日和眼前设宴饯别的场面、气氛，同时呈现于读者。接着进一步打破时空界限，设想离宴散后，行者乘舟南下、送者徘徊岸边的不同情景，“愁一箭风快”以下代行者设想，第三叠“凄恻”以下从送者设想。然后用“斜阳冉冉春无极”一句关合。“念月榭携手”，露桥闻笛。沉思前事，如梦里，泪暗滴”，再用往昔的欢娱陪衬别后的凄凉，既是现时所感所想，也是别后的思念追忆。行者和送者双方都在追忆，都在伤心。短短一百多字的抒情小曲，曲折回环，层次复叠，可谓绝唱。夏敬现在《手评乐章集》中说“耆卿多平铺直叙，清真特变其法，一篇之中，回环往复，一唱三叹。故慢词始盛于耆卿，大成于清真。”此话如单用来评介柳、周的羁旅行役词也是十分切合的。和柳永相比，周邦彦所处时代环境和个人的政治遭遇较为复杂，因而，周的羁旅词内容也较柳词深刻；

岑参在西域的两度思想消沉及其缘由

黄刚

岑参在天空玉德年间曾先后两次出塞，在西域生活了将近五年，是唐代在塞外活动时间最长的一个著名诗人。在岑参研究中，如只看到他部分边塞诗歌反映的激昂奋发一面，显然失之偏颇。但仅仅简单地归结其思想和创作为首次出塞时低沉，二次出塞时高昂，却也不尽符合实际。事实上，他除前期在安西外，后期在北庭也曾有过一度思想消沉，诗风哀怨，此情却几未见有人论及。有鉴于此，本文试就岑参在西域先后两度的思想消沉及其缘由作一探讨，希冀能对比较全面准确深入地研究岑

至于抒情的方法，由于周在柳后，有条件在柳的基础上，吸取同辈词人的艺术经验，加上个人独具的缜密绵丽的风格，所以显得更为曲折细密，技巧也更为纯熟。

周词的音律也较柳词精审严密，其羁旅词尤以拗怒激越、多用拗句、去声字和句中韵为特色。仅《兰陵王》一词，拗句就达十处以上。去声字更为普遍，该词五个领字中四个是去声，“回头迢递便数驿”中“递”、“便”、“数”三字去声连用，“似梦里，泪暗滴”中夹用四个去声字。大量拗句和去声字的运用，有助于振起声调，造成拗怒激越的音响效果。至于句中韵，尤能体现其音律谐和的音韵美，如《关河令》上阕：“秋阴时晴渐向暝，变一庭凄冷。伫听寒声，云深无雁影。”连续四句都有句中韵，从听感上渲染出一种寂寞凄冷的情调。王国维评清真词的声律说：“拗怒之中，自饶和婉，曼声促节，繁会相宣”，这一特点，在羁旅词中表现得也很突出。

参有所裨益。

岑参首次赴边于天宝八载（七四九年），当时，诗人已三十有五，他虽出身没落贵族，自称“相门子”<sup>①</sup>又“遍览史籍，尤工缀文”<sup>②</sup>，却途穷路蹇，仕途坎坷，“出入二郡，蹉跎十秋”<sup>③</sup>，年三十方及第，仅充任“右内率府兵曹参军”九品小京官，他迫切希望复兴衰败已久的祖业，但愿望屡屡落空。渴望建功立业，改变现实境况的念头和他那生就“好奇”<sup>④</sup>的天性结合，促使他十分向往边地立马可致的军功和神异奇绝的风情。正因如此，当此年数建边功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来京，表岑参为右威卫录事参军，辟入安西充掌书记时，岑参欣然入幕赴边。他激动地憧憬着“上马带胡钩，翩翩度陇

①③《感旧赋》 杜确《岑嘉州诗集序》

②④杜甫《汉陵行》有：“岑参兄弟皆好奇”句

头”。①的塞外军营生活，满怀豪情地唱出了“小来思报国，不是爱封侯”②的嘹亮高亢之声，写出了“万里奉王事，一身无所求；也知塞垣苦，岂为妻子谋”③的诗句，洋溢的正是诗人明知边地苦，偏向边地行的慷慨报国之情。可见，在赴西域的最初阶段，岑参的情绪是开朗激昂的，诗风也是刚健奋发的。

岑参此次出塞将近二年，多数时间在龟兹（今新疆库车）高仙芝安西幕中，以后又随高东迁武威，约于天宝十载（七五一年）夏东返长安。观其诗作，可定为此时所作的二十余首诗歌，充满的是一派哀怨失意，思乡愁苦之音。除一二首诗中有数句调子较高外，反复出现的是“出塞独离群”④“塞花飘容泪，边柳挂乡愁”⑤“葫芦河上泪沾巾”（《题首宿烽寄家人》）“晓笛引乡泪”⑥“乡路渺天时，归期如梦中”⑦“容泪题书落，乡愁对酒宽”（《送韦侍御先归京》）等诗句，其中光写到“泪”“乡梦”等字眼的就达二十多处，足见其情绪消极低沉。诗中再也难以找到他刚走向边塞时那些不惜抛妻别子，决心以身报国的豪言壮语，奋发向上的激情几乎消失殆尽。“绝域地欲尽，孤城天遂穷”⑧“桥跨千仞危，路盘两崖窄”（《题铁门关楼》）“飒飒胡沙进人面”⑨“沙磧人愁日，山城犬吠云”⑩，在他笔下，西域特有的大漠、风沙、边关古塞等风光也大多显得那么的凄惨肃杀。。这便是岑参在西域思想和创作所表现的第一次消沉。

岑参在长安半官半隐了三年之后，于天宝十三载（七五四年）又一次出塞，时封常清新迁节度使，表岑参为大理评事，摄监察御史，充安西北庭节度判官，历时近三年，人们大多将岑参此时思想和创作风格评为高昂。本人以为，这并不全与事实相符。确实，岑参那些充满浪漫不羁格调，想象奇特，夸张大胆，色彩瑰丽的传世之作几乎都产生于此时，但岑参的思想决非都可以“高昂”二

字概括，诗风更非一律。纵观此时全部作品，可明显看出以天宝十四载（七五五）秋冬为界的前后不同。这以前的一年多，岑参共留下了三十来首诗歌。这些诗中，流露了“一生大笑能几回，斗酒相逢须醉倒”（《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》）的乐观和兴奋之情，抒发了他为国安边的豪情壮志，形象地渲染了唐军声威，还广泛地反映了“古今传记皆不载”⑪的边地风光。他诗中出现的万里飞舞的白雪，千里狂卷的暴风，冲天而起的瀚海，乳貉旨酒的香气，胡笳琵琶的喧鸣，正是诗人当时情绪高昂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。

大致可定为天宝十四载冬至至德三载春东返止约一年半时间，岑参所写的诗有十来首，透过诗作可知此时其思想又渐趋消沉。这期间，他被正式任命为伊西北庭度支使，官位似小有升迁。凄苦不平、忧患愁苦的声音却又一次充斥在他诗中，他哀叹自己“奉使三年独未归”“自怜弃置天西头”。（《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》）诗人郁郁寡欢，把眼光投向山水草木，“白公多暇，乃于府庭内栽树种药，为山凿池，婆娑于其间，足以寄傲”（《优钵罗花歌并序》）借叹“异于众草”、“异香腾风，秀色媚景”的优钵罗花（雪莲花）“何不为人之所欣赏”（同上），来倾诉自己的一腔不平和悲伤。“悔向万里来，功名是何物”（《日设贺延碛作》）甚至对不远万里赴西域的行动也产生了后悔。可见，岑参在北庭后期的情绪是相当消沉的。综观岑参在西域前后近五年的

①②《送人赴安西》③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 
④《岁暮碛外寄元九》  
⑤《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已到晋昌》  
⑥《早发萧关怀终南别业》  
⑦《安西馆中思长安》  
⑧《安西馆中思长安》  
⑨⑩《送入赴安西》  
⑪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  
⑫《银山碛西馆》  
⑬《岁暮碛外寄元九》  
⑭《许彦周诗话》

生活，其思想情绪和诗歌风格的变化大致经历了高昂——低沉——高昂——低沉四个阶段。而他前后两度思想消沉占了这段时间的大半，是很值得引起人们重视的。

探究岑参这两度情绪消沉的原因，首先应该联系到他的整个生平，他有一个颇为自负的显赫家世，自述是“国家六叶，吾门三相”，<sup>①</sup>他的曾祖父岑文本，伯祖父岑长倩，堂祖父岑羲都曾官至宰相，但都不得善终。就在岑参诞生前二年，岑羲又因得罪伏诛，众亲族俱遭放逐，家门盛极而衰的巨变给岑参心灵留下了深痛的创伤。以后他仕途又屡遭挫折，官位最高不过补阙刺史，怀抱始终不得施展，可以说，岑参是个悲剧性人物。贯穿他一生的是消沉不得志。他复兴祖业的企望和强烈的功名心与现实间一直有着巨大的反差，一生中得意之时少，失意之日多，即使是思想比较高昂的时期，也常常会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而迅速地转为颓唐，趋向消极。在西域数年，应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，但在五年不到的边塞生活中，却仅有一、二年思想比较开朗，先后两度消沉，使他的边地生活也蒙上了深深的悲凉色彩。

对岑参在安西幕中的消沉，曾有人论其原因为边地环境荒凉艰苦，岑参不能适应所致，当然，对此不能完全排除，“终日风与雪，连天沙复山”（《寄宇文判官》），边地的生活条件严酷的，“一身虏云外，万里胡天西”<sup>②</sup>远离家人，更难避免会使人思乡怀友，但是这并非导致他消沉的主要因素。诗人虽是首次赴边，他却早就“也知塞垣苦”，<sup>③</sup>对边地的辽远、艰苦是有思想准备的。诗人又生性好奇，早就热切地向向着“凉秋八月萧关道，北风吹断天山草”（《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》）的西域边塞，对边地风光有着浓郁的兴趣。同样在边塞险恶的环境中，他却也曾能意气风发，慷慨激昂。因此，看来缘由应从他与高仙芝关系上去找。岑参在安西曾写过一首《安西馆中思长安》的诗，中间四

句为“弥年但走马，终日随飘蓬。寂寞不得意，辛勤方在公”。细玩诗意，当是对在高仙芝幕中奔走不定，不得信用的不满情绪的流露。对岑参在高幕的不得意，也曾有人注意到，但多语焉而不详。在岑参诗中，反映这一情绪的诗句有不少。在安西高仙芝幕中，他有过鲍照式的呐喊：“丈夫三十未富贵，安能终日守笔砚”<sup>④</sup>，虽然用的是东汉班超投笔从戎的典故，却与他的高幕当掌书记，专管军中文书告檄之类琐事相符，倾诉的显然是愤激之言。他向友人诉说自己的处境是“白发悲明镜，青春换敝裘”<sup>⑤</sup>极表遭遇困厄，年华空掷之感。“敝裘”典出《国策·秦策》，形容的是苏秦游说秦王不中，潦倒失意窘迫之状，这里，岑参明白无误地指出了自己在高仙芝幕中的郁郁不得志，与当年苏秦相似。天宝十载，岑参回忆高幕二年时也牢骚满腹：“无事向边外，至今仍不归”。（《临洮客舍留别祁四》）回京后还为自己摆脱那种生活而庆幸不已“生事在云山，谁复能羁来”（《题华严寺环公禅房》）在北庭，岑参有《北庭贻宗学士道别》诗，“万里不可料，叹君在军中。读书破万卷，何事来从戎？曾逐李轻车，西征出太蒙，荷戈月塞外，擐甲昆仑东。两度皆破胡，朝廷轻战功。十年只一命，万里如飘蓬。容鬓老胡尘，衣裘脆边风”宗学久任职安西，在高仙芝幕中数年，屡建奇功而久不得封赏擢升。岑参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，诗中李轻本实指高仙芝，虽然是说“朝廷轻战功”，实是指斥高仙芝的寡恩刻薄，赏罚不当。他还在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》中以“早知安边计，未尽平生怀”的诗句回忆自己在安西不为高仙芝重视，空有韬略不得舒展的经历。从这些诗中可以看

①《感旧赋》

②《早发焉耆怀终南别业》

③《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》

④《银山碛西馆》

⑤《武威春暮闻宇文判官西使已到晋昌》

出,岑参在高幕始终处于不得志的境况。至于两人失和之详情已难细考,当与高仙芝在西域所为多不合岑意有关,高仙芝此人贪功滥杀,手段奸诈残忍,天宝九载(七五〇年)他出兵无理攻讨石国,诈与之和,又袭杀其老弱,石国王本鼻施请降,“仙芝使郭送,去开远门数十里,负约,以至为俘,献之阙下,斩之。”<sup>①</sup>实属一味邀功求赏而无义无信行为。高仙芝又极贪鄙,仅破石国就“获瑟瑟十余斛,黄金五六橐驼,良马宝藏甚众,家赏暴钜万”<sup>②</sup>正因高仙芝在西域多行不义,人心丧尽,从而导致天宝十载为大食所败,唐西境葱岭以外皆丧敌手。时岑参正在安西军中,对高仙芝在西域的作为,知之必然甚详,甚为反感。唐时官府中多迎送酬贺之作,边将征行,幕僚写诗送行更成惯例,岑参也娴于此作,唯独高仙芝数次出征,岑参却无一诗相赠,仅有一首附带呈高的,还颇多讽谕<sup>③</sup>其诗文中,连高名亦几乎未提及,诗中也无彼此交游往来的记载。这几年高仙芝官运亨通,青云直上,相继“擢鸿胪卿,假御史中丞,四镇节度使,加左金吾大将军”<sup>④</sup>最后通拜开府仪同三司,岑参作为僚属,亦绝无诗作相贺。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,正是由于岑高关系欠佳,不受重用,直接导致了他此时一腔热望化为乌有,思想消沉,诗风悲凉凄苦。

岑参二次赴边在封常清北庭军中,曾是情绪高昂,意气风发的。雄健奇峭的诗风也形成于此时,成为他创作生涯中的黄金季节。可是,何以这好景不长,随之又出现长达一年半的再次消沉呢?岑参此时有《送四镇薛侍御东归》诗,内有“将军初得罪,门客复何依”句,李嘉祐《岑诗系年》断此诗为天宝十载作,谓将军即高仙芝。细考史实,将军当应是封常清,此诗以作了天宝十五载为是。据新旧《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载,封常清于天宝十四载末入朝,十一月谒玄宗于华清宫,时安史之乱初起,贼焰方炽,玄宗旋任命封

为范阳平卢节度使,抵抗叛军,封匆匆招募队伍,仓促上阵,终因兵败于十二月被处斩。据此可知,封至迟在天宝十四载十月已离北庭东返。不难想象,朝夕相处、礼遇备至的恩主一旦离去,并得罪处死,对于尚远滞西域的岑参思想上会有多大冲击。封岑不仅曾在高仙芝幕中共事二年,在人生道路和思想上亦都有不少相同之处。岑参仕途坎坷,饱尝人世炎凉,封常清官至高位,也绝非易事。他少时流落安西,后从仆从,判官渐以军功擢升至节度使,步入封疆大吏之列,这一步步之升迁,封常清都作过艰苦努力,饱含艰辛,付出过血和汗的代价,他的人品也决非刚愎贪鄙的高仙芝可比,早在高仙芝部下当判官时,就曾不畏权势秉公杖死高的乳母子郑德詮,为人“性勤俭,耐劳苦,出马乘骡,私廐载二马,赏罚分明”<sup>⑤</sup>封常清对才高位卑的岑参是信任和同情的,在北庭,他们过从甚密,尤其在边将中,封又是个不可多得文武全才,有很高的文学修养。从小由“颇读书”的外祖“教其读书,多所历览”。<sup>⑥</sup>后来作捷书,上奏表,很有文才。为此,他们二人有不少共同语言,岑参频频有酬送封常清之作,足见在文学上,封常清也是岑参的知音。因此,岑参再度消沉的缘由,可以断定,正是由于封常清的东归。“将军初得罪,门客复何依”,他哀叹自己的孤单无依,“相送泪沾衣,天涯独未归。”<sup>⑦</sup>面对恩主被杀,国家多难,家信阻绝,漂泊边地的处境,诗人当然要愁肠百结,为之黯然泪下了。

岑参两次在边地的生活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,与封、高的关系更是息息相

(下转146页)

①《唐会要》卷99

②《新唐书》卷135

③见《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》

④《新唐书》卷135

⑤《新唐书》卷135

⑥《旧唐书》卷104

⑦《送四镇薛侍御东归》

修工人也计入承包线,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、产品质量和文明生产等。此外,他们还加强了进出口业务管理,建立销售合同登记表,从洽谈业务到合同完成详细记载,较好地完成了外销业务工作。再次,在职工分配制度上,他们也实行了改革。各分厂对可实行全额计件的工种全部实行计件制,指标一定半年不变,计时工资制的工种也都有很具体的、切实可行的考核指标;同时每个厂的奖金与利润挂钩,奖金上不封顶,下不留底。由于责、权、利三者密切结合,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。劳动生产率一九八三年比一九八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五点一二,一九八四年又比一九八三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三。产值逐步上升,一九八二年每人平均年产值一万六千六百八十元,一九八三年提高到二万五千七百八十四元,一九八四年已达三万五千二百五十九元。一等品率也有提高,从而也为打开销路、做出牌子提供了条件。上面这些经营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,使该企业在生产、经营各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。

联毛公司还与浙江、江西等地以及本市某些郊区挂钩,建立了兔毛原料基地,如他们在市外经委的支持下与川沙县合资开办联川兔毛开发公司,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付业生产。他们又与新疆、南通、蚌埠、湖州、无锡、内蒙等兄弟厂开展生产技术合作,达到了互惠互利。

联毛公司利用了原上海麻纺厂的厂房及部分设备,该厂的其他设备拆迁到松江,另外办起了一个麻纺厂,当年就有部分设备投入生产,并有了盈利。一九八三年产值达到一千五百另六万元,利润三百四十二万元,超过了原定年利润三百二十万元的指标,还提高了质量,他们生产的麻纱线一九八三年参加纺织部门评比,获总分第一,生产的麻袋恢复了名牌产品的荣誉,这不仅有利于国家,还推动了松江地区的工业发展,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。

总之,联毛公司建厂三年多来,利用了外资,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,传递了经济信息,发展了生产,还积累了经营管理改革和改造旧企业的经验,培养了人材,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成绩。因此得到了国家经委颁发的“引进技术、改造现有企业的全优奖”,显示了外因作为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的地位和作用。

联毛公司第二期工程项目进展迅速,目前部分机器已安装,调试完毕,投入生产。由于引进了具有八十年代水平的毛纺织机,一部分技术人员又赴意

大利学习培训过,极大部分工人技术人员在外国专家指导下边学习、边摸索、边安装,提高了技术水平,因此产量,质量有明显的提高。可以预见,第二期工程的全面完成,投入生产,将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更大的影响。外因的作用将更好的显示出来。

当然,外因是复杂的,外因又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对事物的发展发生作用。因此如果对外因不加分析、区别,处理不当,例如脱离我国的实际盲目引进,或不坚持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,而是依赖外因,也会不利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。没有我国国内的条件,例如党的政策的正确,兔毛资源的丰富等等,联毛公司的作用是不能得到发挥的。

联毛公司的成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作用,从外因的角度证明了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性。只要我们正确执行对外开放政策,坚持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,坚持社会主义方向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我们一定能够通过利用外资,引进先进技术,管理经验等等来增强发展经济的能力,争取时间较快克服经济落后,特别是技术和管理方面落后的状况,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。

---

### (上接33页)

关。令人惊讶的是,遍考岑诗,他在至德二载东返后十余年间所作的诗中,居然对此只字未提,这是值得深思的。可能的解释是,他因对高仙芝不满,留下的记忆并不愉快,所以不愿提及。而封常清又因得罪而死,于是诗人也就只好讳莫若深了。确实,由于历史的局限,岑参作为一个希企建立功业却屡遭挫折的士大夫。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幕主紧紧连在一起,他在西域的整个思想变化和创作上起伏都与他同高仙芝,封常清关系有关,前后两度消沉的原因,也都源出于此,研究岑参及其边塞诗歌,对此是不可忽视的。